

主持人语

周 宁 钱林森

1978年，萨义德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在西方的发表，标志着国际理论界清算欧洲中心主义的开始。如今，“汉学主义”理论及相关问题在中国语境中的提出与思考，其意义显然不在于祖述“东方主义”，而是意味着中国学人从学科合法性的角度对这场持续三十多年的学术转型的深刻介入。作为中西学术交流、互动产物的“汉学主义”，在国际间不仅实现了汉学学科的意识形态再生产，还完成了这一生产方式自身的再生产。中国学界近年来对西方汉学译介、研究的热潮，以及非西方国家学术研究中的“汉学主义化”倾向均可作为明证。这些情势，都在呼唤着一场极其紧迫的学科反省，审视愈来愈烈的“自我汉学化”动向。

理论产生于问题与对话。为了凸显“汉学主义”的多重意义面向，使“汉学主义”的相关思考和研究走向理论的自觉，此次“圆桌笔谈”，假南京大学和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联合举办的国际论坛（2010年10月19-22日），发表周宁、顾明栋、张博、张伯伟、杨惠林、程章灿、耿幼壮、钱林森等学者的文章，就“汉学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质、汉学以及“汉学主义”批判中存在的“中国中心主义”陷阱及其可能遮蔽的积极意义维度，以及汉学的对话性建设进路等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重点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汉学主义”理论在众声喧哗中显现出学理上的深入。

“汉学主义”的概念来自汉学，那么，讨论“汉学主义”就必须从汉学入手。汉学究竟是一门科学性的学科，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周宁先生结合自己多年来从事的跨文化形象学研究的心得，在后现代的、批判的知识立场上，追索了汉学的学术谱系，进而指出：“西方汉学从一开始就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它其说是一门学问或知识体系，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汉学包容在汉学主义中。”从研究的基本假设和学科体制上看，20世纪的“中国研究”与汉学研究具有一致性和连贯性，它们作为一种西方塑造文化他者的话语，本质上具有“汉学主义性”。因为西学中的汉学在中国现代观念的起点上就已经植入中国学术，其中的知识合法性危机，可能质疑到中国学术的合法性问题。因此，一场深刻的学科反省势在必行。

顾明栋先生也认为汉学是一种意识形态，但他通过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比较，从历史的角度指出，由于中国从来都不是西方的殖民地，因此汉学作为学术的一个知识系统，并没有东方主义那么强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以汉学概念为基础的“汉学主义”可以视为“认识论的意识形态”，但它是一种智性意识形态，而不是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根据汉学中特殊的人力资源因素，顾先生认为汉学主义的表现有两个方面，即观察和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们全面看待中国的方式和中国知识分子看待中国与西方的关系的方式。因此，汉学主义不是一个区域性现象，而是超越汉学和中西研究领域的一种全球现象。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是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的最大差别，这也许正是提出“汉学主义”的意义所在。

“汉学主义”理论的提出，不难看出其中暗含的萨义德“东方主义”批评的脉络，那么，《东方主义》的理论假设是否适用于汉学的探讨？张博先生指出“东方主义”是“汉学主义”的理论先驱，因此反思“汉学主义”，必须重新审视“东方主义”。在这个前提上，张先生首先思考了“东方主义”的理论缺陷即萨义德的阅读方式对于文本人性意义上的美学空间的关闭及其潜隐的本质主义倾向。以“东方主义”的理论假设思考汉学，必定会排斥他者的目光；如果将西方学者的学术成果不加区分全部视为“汉学主义”的变体，将失去打开我们

“思想的可能性”的良机。也许，如何积极地创造属于中国文化自身的独特批评语言，才是在对“汉学主义”的反思之外一个真正需要思考与实践的话题。

耿幼壮先生肯定了“汉学主义”理论的现实意义，但他又谨慎地指出“汉学主义”所具有的明显的“东方主义”西方话语方式或理论模式色彩，对于其概括和解释某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知识生产方式的理论意图而言，在学理层面的支持就显得有些欠缺。耿先生没有直接提出“汉学主义”能否直接运用“东方主义”的批评模式，而是举了谢阁兰、福柯、费诺罗萨、庞德、德里达、石江山、叶维廉等人的写作、研究实例，生动鲜活地呈示了“东方主义”论述的缺陷，由此提请我们注意“汉学主义”理论中可能暗含的“中国中心主义”话语。

面临着今天西方汉学新一轮的译介高潮，我们不能不去思考汉学或汉学主义对中国学术究竟意味着什么，介绍与研究西方汉学的批判态度将缘何而起？**张伯伟**先生认为，任何一项人文学研究也都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留有意识形态的痕迹，汉学也不例外。但这与从意识形态出发、为意识形态效命完全是两回事。如果把汉学研究视为“汉学主义”，把“汉学主义”视为以“殖民”为核心的意识形态霸权，那么学术问题就完全可能演变为政治辩论或冲突。鉴于此，张先生在中国学术的西化和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的治学思路。其基本内涵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研究，应该返回东方、返回亚洲、返回中国。然而从中国出发不是局限于中国，而是要以文化圈为单元，以中国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为参照，在更深入地理解汉文化的同时，也提供一幅更好地理解当今世界的图景。”

钱林森先生以法国当代著名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的“另类”学术实践路径为例，思考汉学究竟是知识、学问，还是一种方法、工具的问题。钱先生从西方学术史和思想史的层面深入剖析了于连的“创新和特异性”，即“以汉学作为方法”，对欧洲固有汉学模式的超越；以及“以中国（汉学）作为工具”，对西方传统哲学思路（方法）的更新。“汉学作为方法”，超越了汉学作为知识和学问的“专业”“博学”的虚假幻象，构建起“发问的桥梁”；而“中国（汉学）作为工具”则可以“从他乡寻求对话的伙伴”，探寻反思自身文化的“外部”视角。就思想的意义而言，提出问题远重于提供答案。于连那不无争议的学术实践方式和文化策略，对于操西学、汉学的中国学者而言具有深远的启示，它提请我们反思自己的学术研究指向究竟在何方。

程章灿先生从研究主体的角度指出，把研究汉学学者涵盖在“国外（西方）学者”这一共名之下，容易遮蔽汉学研究的丰富性，因此不能简单地将汉学研究研究与殖民话语等同起来。同时，西方汉学亦非一个封闭、静止的系统。它不断吸纳来自中国和西方的各种学术信息与研究资源，并且从十九世纪开始，通过中西方学者的合作、对话与交流，已经参与到近现代中国学术传统的建设进程之中。因此，当代学术已难以确定哪些纯粹是东方的，哪些纯粹是西方的。“汉学主义”如果真的存在，那么也必定内在于中国的学术传统之中。不同的学术范式之间的对话、通融将是大势所趋，而不是彼此以“主义”相称相斥。

“他者”的意义不在于自我印证，而在于促使自我反思。**杨慧林**先生的《“汉学”之“他者”何以成为“他者”》对于西方汉学研究的批判与对话性建设进路问题做出了有益的探讨。杨先生指出，“如果说汉学研究的前提是‘他者’，那么其实质当在于‘对话’而非‘对象’。”因为将“对话”的一方“对象化”是“汉学主义”所及的问题和积弊，所以“让他者成为他者”这一“非中心”或者“解中心”的话语策略，可以让一切言说都包含在“倾听”和“回应”的对话关系中，汉学尤其如是。由此我们看到，“汉学主义”理论的提出的真正意义也许正在于超越“汉学主义”。

本次“圆桌笔谈”多承南京大学人文社科高研院“汉学主义：理论探索”论坛主持人何成洲教授支持，多承周云龙博士协助和上述作者积极参与，在此一一谢忱！